

歌剧《红船》嘉兴开排

据光明日报,红色血脉生生不息,红船精神永放光芒。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剧《红船》5日在浙江省嘉兴市开排。

歌剧《红船》以中共一大13位代表和见证人王会悟为重点,重点从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的视角切入,以点带面,展现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诞生,承载着历史选择、民族希望出发,劈波斩浪驶向辉煌的史诗画卷,恢宏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出征起航和“红船精神”凝聚升华的光辉历史。

据介绍,目前歌剧《红船》已完成剧本审定、主创团队签约和音乐创作等工作,正在进行舞美、服装、道具的设计和试唱选角工作。而在表现形式上,《红船》更注重创新与突破,将嘉善田歌、湖南湘歌等元素融入其中。进入联排阶段后,《红船》将于8月15日在嘉兴大剧院试演后,继续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剧目进一步加工与完善,努力将其打造成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经典之作,以高质量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开幕

据新华社,我国首个国家级航海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7月5日迎来开馆十周年纪念日。当天,以航海火器为主题的文物展览“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开幕,多种珍贵文物首次向公众展出。

据介绍,“中国航海火器文物展”作为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特展,荟萃了馆藏的130余件(套)展品,展览分为“火器溯源”“威名世界”“中外合流”“曲折发展”“走向复兴”五个部分,从多个角度展示我国航海火器历史面貌和航海科技的发展历程,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策展人李学茂介绍,在展文物既有元代“至正元年造”铭文铜手铳等古代珍贵文物,也有展示当代国防建设成果的“辽宁舰”模型。此外,北洋海军成军纪念金杯、金牌是首次向公众展出。

此外,中国航海博物馆和洋卢集团5日签署了“泰兴号”沉船回瓷捐赠备忘录,后者将于今年下半年向前者捐赠回流瓷器100件。“泰兴号”沉船是清代道光年间沉没于今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的一艘中国商船,船货以清中晚期民窑青花瓷器为主。该沉船被国外商业团队打捞后,出水文物在国际市场拍卖出售。洋卢集团2018年从海外购回10万余件该沉船出水瓷器,2019年曾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了190余件瓷器。这批瓷器对研究我国对外海洋贸易情况、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等具有重要意义。

动画作品《天宝伏妖录》获广大观众一致好评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在信息爆炸、传播碎片化的时代,如何让一部动画焕发生命力,引人入胜的故事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素,而更为关键的,还在于文化。近期播出的《天宝伏妖录》,是晋江人气作者“非天夜翔”的热门作品。虽是玄幻类动画作品,但其中渗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所不在,比如开放、包容的大唐盛世成为故事背景,不仅让观众再次领略到曾经的繁华,更润物无声地树立起大众心中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

当然,动画的文化主题与文化创意至关重要,但毕竟动画是一种艺术形式,动画对文化的表达是一种艺术的表达,不能把文化主题变成动画创作的包袱和累赘,否则动画则是一个生硬的木偶。因此,将内容顺畅表达,被观众普遍接受,同样是摆在广大动画创作者与从业者的课题。《天宝伏妖录》已是一部被众多读者接受的文学作品,拥有良好且扎实的受众基础。而在此次文化形式转化过程中,制作方充分考虑了原著粉群体需求,又创新式的进行了合理剧情改编,抓住其绝美的画风场景、惊艳的人物建模以及炫酷的3D特效等表达核心要素,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第68届卢布尔雅那艺术节开幕

据新华社,第68届卢布尔雅那艺术节7月1日晚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开幕。在议会广场,斯洛文尼亚爱乐乐团和合唱团、钢琴演奏家携手瑞士指挥家奉献了一场音乐盛宴,为卢布尔雅那夏日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艺术色彩。

受新冠疫情影响,此次音乐会只允许500名观众入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入场时均被要求使用免洗消毒洗手液,座位间距也被拉开。但在场地护栏外,优美的音乐还是吸引了众多市民围观观看。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8月30日。据了解,今年艺术节每项活动都须得到斯洛文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批准,并严格遵守观众人数限制。

卢布尔雅那艺术节是斯洛文尼亚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每年吸引约6万名观众到场观看,组织方会精心准备交响音乐会、歌剧、戏剧、芭蕾舞等多种多样的演出,邀请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登台献艺。新冠疫情影响之下,今年受邀嘉宾和演出规模都受到影响,组织方已在其网站上通知部分提前购票的观众退票。

6月下旬以来,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松,国外游客增多,斯洛文尼亚新冠疫情出现反弹,其中输入型病例占较大比重。斯政府已允许集会人数从500人下调至50人,但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批准的官方活动除外。

(口记者 张依盟 整理)



类,所以,不但没有影响汉字的发展,而且使数量日渐增多的汉字形式得到了完整保留。宋元明清时期,汉字一直一帆风顺地发展,尽管其间有蒙(元)和满(清)两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的王朝,但汉文化的强大根基,决定了汉字依旧是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主导者。

20世纪 汉字遭遇两次生存挑战

时至20世纪,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却面临了两次生死存亡的大挑战。一次是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另一次是20世纪末的电脑输入法。前者主要是人为原因所致,后者则是客观的信息时代科技挑战。无论是哪种原因,都险些使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汉字遭遇灭顶之灾。

早在明清时期,为学习汉语和传教目的,西方传教士曾做过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实践,这是汉字拉丁字母注音实践的源头。20世纪初,受西方语言学世界文字“三段论”(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必须经历表形、表义和表音三个由低到高的阶段)误导,加之当时国人对汉字的性质尚缺乏正确认知与定位,致使这一理论成为当时思想激进者认为汉字落后,进而主张废除汉字、推行汉字拉丁化的理论基础。在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影响之下,当时激进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如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汉字改革说》1922年);甚至一生用汉字创作的鲁迅先生也视汉字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关于新文字》1934年)。然而理论依据的错误,尤其是汉字拉丁化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诸如方言、同音字词等问题,使汉字拉丁化半途而废,而不得不被权宜的汉字简化方式所替代。可以说,自民国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汉字简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使汉字最终走向拉丁化道路所做的过渡性动作。汉字拉丁化的激进想法与实践,险些切断了延续数千年的汉字基因,今日思之,令人不寒而栗。现代语言学研究表明,不但认识到了世界文字“三段论”的荒谬,而且也认识到了汉字进入形声造字阶段之后,本身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表音文字了。实践证明,汉字是最适合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中西文字之间并不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也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区别,而只是发展方向不同而已。

同样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汉字简化要求与程度不同,致使今日之汉字尚有地域上的繁简差异。近年来大陆学者提出的“用简驭繁”主张与实践,以及港澳台地区逐渐认识和接受简化汉字的趋势,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和而不同。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人发明的电脑问世与普及,汉字又一次遭遇全新的科技挑战。汉字能否输入电脑,是其在新的信息科技时代能否与世界接轨的大事,这使得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汉字再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为攻克这一技术难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内外华人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先后开发出多种汉字操作系统和汉字输入法。输入法虽不是汉字本身,而只是维护汉字在当代生存的外在技术保障,但汉字输入法的努力与成功,无论从思想感情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体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汉字与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与挚爱之情。饱历风霜的汉字历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汉语语言简意赅,在联合国用多种语言同时发布的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国的普通士兵,其家书充分说明了当时汉字在民间的普及。

战国至秦汉 篆隶时代的文字混乱与统一

商朝与西周虽然实现了相对统一,但与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帝国尚不能同日而语,二者存在“王”与“帝”的本质差别。但商周时期的汉字尚处于成长发展阶段,又为庙堂所垄断,所以文字的发展轨迹仍然朝着越来越规范的方向发展。然而时至东周,进入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战乱时期,诸侯国之间因长期割据而出现了“文字异形”的局面(《说文解字·叙》),汉字发展的地域特点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六国文字之差异达到了诸侯国间不能相互释读的程度。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在“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的背景下推行“同书文字”(《峰山刻石》)政策,这是汉字尚处于篆书形式时期的整合,也是汉字史上的第一次整理与统一。虽然当时有“秦书八体”(《说文解字·叙》)之说,但统一后的汉字形式是通过小篆规范。秦朝通过颁发用小篆书写的读物《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迅速实现了文字统一的大业,在“正文字”和“教小学”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但新推行的篆书并不实用,所以也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普及,而是仅仅应用于官方刻石和部分官方政令等极其狭窄的领域。加之秦朝短祚,致使后来的秦小篆应用范围越来越小。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忽略秦始皇在汉字统一方面的功绩,秦小篆首次以国家政令形式为汉字确立了一种规范,它不仅因中国第一部字典——许慎(约58年—约147年)《说文解字》之推介而成为学术界研究先秦文字的津律,同时也成为书法艺术领域的一支艳丽花朵。

几乎与官方以小篆统一文字同时,先于小篆就已萌芽的另一种民间新书体——隶书,在经历了由秦隶到汉隶的漫长演变之后,因高效实用的优势被应用于更加广阔的领域和场合。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叫做“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第一次显著的形体质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变的结果,一是改变了此前篆书的象形性特点而逐渐符号化,二是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书写速度。秦篆汉隶,既是大一统秦汉王朝的标志性文字符号,也是秦汉

两朝的标志性书法艺术形式。历史上的古今文经学之争,仅从汉字形式上讲就是篆隶之别。鉴于当时流传的经书版本各异,且多有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现象,东汉熹平年间,议郎蔡邕(133年—192年)等用隶书书写的《熹平石经》四十六碑,即中国最早的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对维护和推动文字的规范与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魏晋至清 楷书时代的文字整合与延续

从汉末魏晋之乱到隋唐盛世,是楷书从产生到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汉字发展演变史上的又一次由乱到治的过程。此时期的汉字又完成了一次变形过程——楷变,书写更加便捷的楷书取代了隶书并得以逐渐发展成熟。自此,楷书也成为使用时间最长且至今仍未被取代的汉字形式。

与汉字命运相伴的,是自东汉亡国直至隋朝统一之前,中国又经历了一次朝代更迭、战火频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加之其间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汉字再度遭遇了无统一管制状态下的自由发展阶段。亲历了当时战乱,并由南梁而入北齐,又由北齐仕隋的颜之推(531年—约597年)描述当时的文字纷乱情况说:“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便便转移。尔后文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章,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颜氏家训·杂艺》)。这种文字纷乱的局面是新统一而与秦朝同样短祚的隋朝无力解决的,所以,汉字的整合工作一直推迟到了唐玄宗时期。

这项工作是由颜之推的第四世孙颜元孙着手做的,颜元孙是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伯父,他编纂了一部《干禄字书》,“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四库提要》卷四一)。书中将当时的汉字分作正、俗、通三体,并规定了三种字的应用场合。该书于唐大历九年(774年)经颜真卿书写勒石流传,成为当时文人用字的重要参考。可见汉字的第二次整合,起初并非官方行为而是文人的个人行为,但对当时的文字规范起了很大作用。此后又有多种字书问世,最著名的是清朝的《康熙字典》,但以上字书只是对汉字的收集与归

要明确这个问题,最关键要弄清楚《礼记·乐记》是什么时候写成的。

《荀子·乐论》很清楚是出于荀子之手,作者和年代是比较清楚的。关于《礼记·乐记》的写成年代及作者,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是战国时代公孙李子所作。郭沫若等持此观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汉初年,由河间献王召集手下的一批儒生、乐师撰写而成。如今,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战国公孙李子说恐不能成立。但是,也没有最后定论。

从考证的角度来分析,形成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有准确详实的论据来支撑,包括考古学、最新成果。有很多学术观点,随着新材料、新成果的出现,会产生甚至截然相反的变化,这方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比如《老子》究竟是什么年代的文献?在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前,学术界除一两位学者外,主流意见基本认为,《老子》一定是晚出的。例如,钱穆力主“晚出说”,就认为《老子》问世当在孔孟之后,甚至庄子之后。马王堆帛书出土后,证明《老子》形成至少可以推进到战国中后期。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传世本。这些考古成果,对《老子》版本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就翻过来了。

颜世安表示,对于《礼记·乐记》,目前并没有更多新材料引证。他倾向于认为,晚于《荀子·乐论》。理由是,《礼记·乐记》理论更丰富、庞杂,似乎接受了《荀子·乐论》的一些理论。相比较而言,《荀子·乐论》更像

是草创时期的理论。

由此以来,我们可以认为,荀子是儒家第一个专门论乐的。在他之前,也有其他一些文献谈到音乐,但都是只言片语。荀子以“乐”为标题,专门论乐,也说明荀子已经认识到,礼和乐虽然是相互配合的,但乐是有其独特性质和功用的。

乐的独特性质和功用在哪里呢?《荀子·乐论》中讲得很简洁,后世儒家也都认可。“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且“乐者,理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跟感情有关,礼跟道理有关,来确定人群秩序,把人分成不同的位置。每个人安于自己的位置,可是每个人内心又各有感情,把感情抒发出来,最典型的表达形式就是音乐。

《荀子·乐论》中讲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意思是说,圣人特别注重音乐,那么音乐为什么成为礼仪的一部分?因为礼仪可以引导人去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荀子认为,在这方面,音乐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音乐发挥的作用,不是通过强制的方法去执行,甚至也不是通过

从目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至今已经历了约三千五百年的风雨。生生不息的汉语言简意赅,在联合国用多种语言同时发布的文件中,最薄的那本一定是中文本——

汉字,“会说话”的中华文化符号



杨加深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承载着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字符号就是文字。撇开学界关于商代之前各种出土符号的争议不谈,从目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至今已经历了约三千五百年的风雨。这个历程和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同舟共济,在吸收融合外来文明并形成汉字文化圈的同时,也曾遭遇过外来文明的挑战与冲击,但汉字顽强的生命力与强大的包容性,使它最终成为世界古老文字中唯一没有间断并传承至今的奇迹。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始终与国家命运风雨同舟。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大致不谬的规律,即国家统一时汉字的形式也相对统一(如秦汉时期);诸侯或邦国割据时汉字的形式相对多样(如战国和魏晋时期)。但无论如何,汉字的发展脉动和各种文字形式的内在关联从未中断。从殷商甲骨文发展至今,汉字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商周至春秋

由群众创造,为庙堂专用

汉字的产生,对中华先民而言是一件“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大事,以致西汉人刘安用“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来描述传说中仓颉造字的神话。而对该句之注解始于唐人张彦远:“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可见中华先民对汉字之崇拜与景仰。

毫无疑问,汉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成熟的甲骨文之前,汉字一定有一个甚至多个更早的源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的在手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子”(《门外谈》)。但我们目前所成体系的最早文字形式——甲骨文,却基本是为商王室所专用的,西周文字的使用范围虽有所扩大,但仍局限于周王和贵族之间。当时的汉字是高不可攀的庙堂文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东周时期。商代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和西周礼器上主要用来歌功颂德的铭文,都无不证明当时文字高高在上的地位。换言之,在何时是否会使用汉字,既是文化地位的象征,更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汉字长期被庙堂所垄断。

汉字由庙堂向民间回归始于春秋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他开始汉字才由庙堂向民间传播,这是一个汉字从人民群众中来,又到人民群众中去的回归。孔子是将汉字由庙堂向民间传播的文化伟人,他校订六经,兴办私学,有教无类,桃李满园。经过数代人的流传,本来高高在上的汉字逐渐在民间普及,同时由汉字承载的中国先秦文化也传到民间。此后,自上而下的文化与自下而上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黑夫”与“惊”两兄弟的木牍家书,这是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家书,此兄弟二人皆是秦

荀子也是音乐理论的一个开创者

本报记者 于国鸣

在省尼山书院承办的荀子公开课上,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颜世安以《荀子的礼乐思想》为题,深入分析和讲述了荀子的礼学思想,及其对后世儒学发展的长期影响。他认为,荀子在音乐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开创者。而从“礼”的角度讲,作为先秦儒家一位集大成者,荀子把“乐”和“礼”合起来,也是对先秦“礼”的理论的最后完成。

儒家重视礼乐,认为礼乐可以教化民众,如果民众皆好礼乐,为政者不用亲政即可把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儒家的礼,是贵族阶层制定并流传开来的。刚开始,“礼”和“乐”并没有区分开,在孔子的观点中,礼和乐也是合在一起的,乐就是礼的一部分。贵族生活讲究礼仪,不同官阶的人见面,比如诸侯侯见天子,卿大夫见诸侯,卿大夫见卿大夫,都要有相应的礼仪,这个礼仪有时就以“乐”来表现。

后世儒家试图把礼乐从贵族的小圈子向整个社会层面拓展。这个时候,礼和乐仍然没有分开,一直混合在一起讲。第一个把礼和乐分开讲的,恐怕就是荀子。

在这里,要先弄清楚《荀子》这“第一个”的相关情况。从先秦到两汉,儒家文献中有两篇专门谈音乐的,一篇是《荀子·乐论》,一篇是《礼记·乐记》。这两篇文章,哪篇时代更早呢?哪篇更早,也就意味着那是第一次确立“乐”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文献。